

文章编号: 1000-0585(2000)03-0283-08

集团异化与国家地理研究的理论思考

文云朝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要: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是当今世界经济的时代特征。作者从集团化发展的理论分析和经互会解体及北美集团内部冲突的实例分析中, 提出了集团异化的概念; 并通过集团异化的外因和内因的分析, 说明集团异化的出现决不是孤立的、偶然的, 是在一定外部条件下集团本身内在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同时集团异化也是区域合作中国家关系调整和各国地缘战略演变的具体反映。因此, 集团异化这个当代区域合作中的新现象和新问题给国家地理研究提供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 也引发了学科发展上的理论思考, 包括研究领域的拓宽、研究内容的深化和研究方法的探讨。

关 键 词: 集团异化; 国家地理

中图分类号: K91 **文献标识码:** A

1 问题的提出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在这一背景下, 区域性经济合作呈现日益强劲的势头, 其中包括区域经济集团的形成和发展, 有人称之为区域集团化。

对于区域集团化与全球化、一体化的关系, 目前人们的认识还很不一致。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 即互补发展论、矛盾对立论和一分为二的两重性论^[1]。笔者赞成最后一种观点。因为但凡经济集团都具有两大本质属性。一是排它性。集团的经济法规只适用于集团内部, 成员国处理国家间的经济关系自然内外有别, 即使集团开放性的加强, 也难完全消除这种差别, 这就决定了集团对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发展, 既有积极作用的一面, 也有消极作用的一面。二是国家主权的让渡, 成员国必须把部分国家主权转让于集团。在这种情况下, 当成员国的权利、义务与国家整体利益相悖时, 各国宁可选择民族自主, 而不愿依从任何超国家机制^[2]。这样, 它与集团的矛盾、斗争便不可避免, 依据利害冲突的性质和程度, 集团化的进程有可能受挫、倒退, 甚至解体。只要国家还没有消亡, 这种矛盾、斗争也就不会消失; 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可能支配集团事务的背景下尤其如此。70 年代末, 欧盟各国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的恢复, 是集团化进程受挫、倒退的例子^[3]; 90 年代“经互会”的解体, 以及美国抛出“赫尔姆斯—伯顿法案”(简称“赫—伯法”)^①, 导致北美

① 美国借 1996 年 2 月 24 日古巴空军击落两架侵犯其领空的, 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古巴流亡份子“救援兄弟会”的海盗飞机事件, 由参议员赫尔姆斯·伯顿提出一项强化对古巴实行经济封锁的法案, 故称“赫尔姆斯—伯顿法案”。

收稿日期: 1998-07-14; 修订日期: 1999-09-15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49771038)

作者简介: 文云朝 (1937-), 男, 研究员, 湖南宜章人, 主要从事世界地理和区域合作研究。

集团成员国之间制裁与反制裁的公开对抗,则是集团化进程中逆反行为的反映。在这里我们借用哲学术语中“异化”一词,称这种现象为“集团异化”。

“集团异化”的概念,就是把区域经济看成世界经济生活中的一种客观事物,是区域经济合作的一种形态。它在其发展进程中,在一定条件下可不同程度地分裂出它的对立面,成为集团的异己力量^[4]。目前这种异化的表现形式有三种:一是集团内部个别成员国之间国家关系的公开对抗,如北美自由贸易区中,美国和加拿大围绕“赫—伯法”以国家立法形式展开制裁与反制裁的公开对抗;二是集团内部由区域合作法规所维系的经济关系的整体倒退,如 70 年代末欧共体各国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的全面恢复;三是集团的整体分解,如 90 年代初“经互会”的解体。

“集团异化”现象不仅影响集团本身的发展,而且在集团外部,对国际事务也会产生这样那样的连锁反应,我们称之为“异化效应”。在冷战体制结束后,这种“异化效应”尤为强烈,构成对“霸权主义”的一种公开挑战,这对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将产生积极作用。

总之,“集团异化”是当代区域集团化过程中的一种新现象和新问题,而且显示出广泛的世界意义。它的出现绝不是孤立的和偶然的。它是各国特别是世界大国和地区大国,国家战略决策转变和对外政策调整的直接反映,既有特定的国际背景,也有内在的决策依据,并由此决定着它发生、发展的规律。从国际空间联系和空间结构的角度,用全球地缘战略的视野,去研究集团异化现象和异化效应的发生、发展及其原因,对于推动区域合作的健康发展,对于把握 21 世纪世界多极格局的走势,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这在学科发展上,对国家地理研究也是一种有力的促进。

2 集团异化的外因与内因

集团异化与集团化现象一样,是各国在处理国家关系上的一种战略决策的产物。这种决策的依据,既有外部因素——宏观的国际背景或区域背景,更取决于集团内成员国之间的内在因素。关于 80 年代末以来,集团异化现象趋于活跃,并产生强烈轰动效应的国际背景,作者在“集团异化与亚太区域合作”一文中已有具体分析。本文主要对集团异化产生的内因作进一步剖析。

集团异化现象产生的内在原因,从根本上讲在于集团成员国之间,在涉及各自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所存在的分歧和利害冲突。这种利害冲突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但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诸多因素也有密切关系。从“赫—伯法”冲突和经互会解体的实例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集团异化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关系。

2.1 政治因素

与集团异化现象有密切关系的政治因素,主要有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区位、国家关系、历史遗留问题等。其利害得失的权衡,既表现在成员国之间,也表现在对第三国关系上。

2.1.1 意识形态 在北美集团中,在对古关系上,加拿大的意识形态取向显然与美国不同,一向选择对话、接触、交流的政策。在经互会中,对待西方的意识形态攻势,苏联与其东欧盟国的态度明显有别;前者戒备有加,后者中庸处之,甚至有融合倾向。

2.1.2 地缘政治区位 古巴的地缘政治区位,其意义对美国 and 加拿大显然不同;对前者是近邻,被当作其“后院的一颗钉子”;对后者则不存在此类忧患。对待东欧国家的地缘政

治区位, 经互会成员国各有盘算。苏联力图维持其东方集团“西部前沿”的地位, 而东欧各国则想以其区位优势为筹码, 实现“与欧洲结为一体”。波兰正是以其“处于欧洲地缘战略主轴上的中心位置”的区位优势^[6], 成了加入“北约”的先锋, 从旧的结盟转向新的结盟。

2.1.3 国家关系 在对古关系上, 美国不愿看到其后院有一个共产党政权的古巴, 并对其坚持实行封锁、颠覆政策, 美古关系长期处于对抗状态。加古之间则不同, 国家关系基本不存在障碍, 也从未参与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在经互会中, 由于苏联长期推行大国沙文主义, 在成员国中积怨颇深, 因而与东欧盟国的国家关系隐藏着严重危机。

2.1.4 历史遗留问题 美古之间有领土争端, 美国占据着古巴领土关塔那摩, 设立军事基地, 加古之间则不存在历史遗留问题。

2.2 经济因素

对集团异化直接发挥作用的经济因素, 主要有战略资源、经济实力、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等等。前两个因素直接关系到力量对比状况; 后两个因素直接涉及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国家之间彼此力量对比的消长和国际竞争力的强弱, 必然在对外关系中对国家利害关系的判断产生直接影响。

2.2.1 战略资源 加拿大是世界著名的资源大国, 而且拥有若干战略资源优势, 铀矿储量居世界第四、美洲第一; 镉和钾盐世界第一; 钛、镍世界第二; 铜世界第三^[7]; 此外, 能源也相当丰富, 尤其是天然气。美国在战略资源上有求于加拿大; 反过来, 加拿大则可以此作为处理美加关系的一个筹码。

2.2.2 经济实力 加拿大是西方“七国集团”的成员, 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在 90 年代初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时, 经济实力世界排序美国第一, 加拿大第八; 加拿大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美国的 70%, 因而成为美国不可小看的伙伴。经互会解体前夕, 波、匈、捷、保、罗五国的国民生产总值 (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 相当于苏联的 30% 左右, 明显高于当时苏联与美国相比的水平 (26%)。所以这些国家不甘居“小兄弟”的地位, 自恃可以对苏联说“不”。

2.2.3 国际贸易 进入 90 年代, 加拿大的国际贸易活力超过美国。1990~1995 年的外贸增长速度, 加拿大高出美国一个百分点, 而美国外贸逆差和加拿大的外贸顺差一样呈增长趋势, 1996 年加拿大的外贸顺差 288 亿美元, 美国的外贸逆差达 2 394 亿美元。美加贸易中, 美国对加拿大的逆差为 213 亿美元, 加拿大对美国的顺差为 420 亿美元。对比之下明显反映出加拿大国际竞争能力的增强。在对古巴贸易上, 美加之间利益完全不同。美国与古巴不存在正常贸易关系, 而加拿大对古巴的贸易则迅速增长, 1985~1995 年增长了 6.3 倍, 从 3 200 万美元增至 2.34 亿美元^[8]。在经互会内情况也大体类似。1986~1991 年, 东欧五国对美、德、法、日的贸易额增长 43.3%, 而苏联相应只增长 4.3%; 1991 年前者对美、德、法、日的贸易总额已达 202 亿美元, 西方大国已成为其主要贸易伙伴, 他们转而重视西方市场自然顺理成章。

2.2.4 国际投资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推动下, 美国的盟国在海外的直接投资越来越活跃。加拿大自 80 年代以来, 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美国; 1980~1994 年加拿大增长 3.7 倍, 美国只增长 1.8 倍; 加拿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 从 1980 年的 225.7 亿美元, 增加到 1995 年的 1 103.9 亿美元。90 年代以来, 跨国兼并与收购的发展势头, 加拿大比美国更猛; 按控股总额和销售总额, 1991~1995 年美国分别增长 1.7 倍和 1.5 倍, 而

加拿大分别增长 4.3 倍和 3.7 倍^[9]。而且加拿大的大财团如矿业公司已进入古巴投资市场,在那里有直接的经济利益,因而不愿屈从别国的对外政策而牺牲自己的国家利益。在经互会中,东欧五国吸收的西方直接投资 1990 年只有 3 亿美元,而 1991 年猛增到 24.5 亿美元,这自然构成一种巨大的吸引力。

2.3 文化因素

在国家关系的研究中,文化因素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从美国中央情报局插手“文化冷战”^①,到“文明冲突论”的提出,反映了美国政界和决策者们,在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上,对文化因素的重视程度。就集团异化现象分析,尽管从北美集团看,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在地缘文化上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和利害分歧,但从经互会的解体看,文化因素不能不说是其中一种深层次的原因。

2.3.1 民族意识(心理) 东欧国家^②,还有前苏联的波罗的海国家,把苏联解体和经互会解散,看成是真正的“解放”。认为该地区有它自己的历史;在 14~18 世纪的大约 400 年间,它们曾属同一个国家——波罗诺利图安王国(Royaume Polono-Lituanien),后来被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瓜分。而把二战后的独立看成是“处于苏联的占领之下”^[6]。这种民族心理,对经互会解体的作用自然不可低估,但却往往又是过去被人们所忽视了。

2.3.2 民族文化 在语言文化、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上,经互会各国也属于复杂的混合体。波兰、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都属于斯拉夫语族,而罗马尼亚属罗曼语族,匈牙利属芬兰-戈尔语族^[11]。在道德与价值观上,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又更接近西方,更赞同西方的民主、自由,“属于同一个欧洲文化圈”的意识十分强烈^[6]。这是经互会内部一种深层次的地缘文化分歧。

2.3.3 宗教文化 经互会各国的主要宗教,虽然都属于基督教,但其中也有宗教派别上的区别。苏联和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属东正教,而波、匈、捷则属天主教,与西欧发达国家在宗教上更接近,故后者更易接受西方意识形态。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集团异化并非一种孤立、偶然的現象。它是在一定外部条件下,集团本身内在矛盾运动的结果。它对于冷战后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的走向,对于 21 世纪国际新秩序及世界多极格局的建立,将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它对于国家地理研究,也提供了一些重要启示,并由此引发出对学科发展的一些思考。

3 关于国家地理研究的理论思考

3.1 研究领域的拓宽

国家地理研究属于全球空间尺度上的区域地理范畴。作为地理学分支学科的区域地理学,其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已经从区域特征和区域差异研究,发展到区域横向联系或区际研究。美国地理学家把局限于前者的区域地理研究,比作是“作茧自缚”。中国学者把后者看成是区域地理的新研究领域,李春芬先生更明确指出,区际联系是“区域地理学的近期前沿”^[11]。在人类进入 21 世纪之际,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已成为世

① 这是英国《泰晤士报》1997 年 7 月 1 日的署名文章所揭示的关于冷战时期以来大规模文化冷战的故事。

② 指波、捷、匈、保、罗五国。这是过去的“苏联东欧”的概念。按欧洲的区域划分,实际应称为中欧国家。

界政治、经济的时代特征。在这种形势下, 超越国家空间的区际联系, 无论国家之间、区域集团之间(如欧盟与东盟)、国家与集团之间(如中国与东盟)、还是集团成员国之间, 在当今国际生活中都占有越来越突出的地位。因而给区域地理、特别是国家地理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机遇。

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地理研究, 是区域地理在国境外的延伸, 其基本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 是国家(地区)地理特征与国情研究, 以及国家和地区之间区际差异的比较; 而对于区域尺度或全球尺度上的国家关系的地理背景, 即国际关系中内在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战略问题, 则疏于研究。这种状况与当前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时代特征极不相称, 既造成国家地理研究与国家需要的脱节, 也不利于学科的发展。这种局面的形成, 一方面与传统区域地理学框框的束缚有关, 即只局限于区域个性和区域差异。另一方面, 也与长期以来对地缘政治学不切实际的批判有重要关系, 使学术界心存余悸, 不敢堂堂正正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研究国家关系; 同时也与学术思想上的误区有关, 把某种学术派别、学术理论与整个学科混为一谈^[12]。

事实上, 80 年代以来, 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集团化和集团异化现象, 既表现了当代国家关系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也表明在涉及自身利益的国家关系调整及其战略决策上, 地缘经济要素的作用往往超过地缘政治要素, 而且还往往与文化、科技、国防等要素交织在一起。这不仅说明以地缘政治的观点研究国家关系和国际关系, 符合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 而且沿着这个研究方向, 还可进一步发展地缘研究, 从地缘政治延伸到地缘经济、地缘文化、地缘战略等等。战后特别是 80 年代以来, 西方地缘政治学的一些著名学者, 如 G·帕克和 P·奥沙利文在研究世界政治格局和国家关系时, 已经率先这样做了^[13]。我们在这方面也应有自己的探索, 把国家地理的研究扩大到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地缘战略等等。

3.2 研究内容的深化

集团异化与当今世界的集团化、多极化一样, 反映了当代区域合作中国家关系的调整和各国地缘战略的调整, 是各国的决策者们, 在一定的国际背景下, 从本国和别国的基本国情出发, 对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国防等各种要素综合分析评估, 权衡国家利害得失的一种战略决策的结果。面对这类新课题, 我们的研究工作不仅要注重这种国家关系的调整和各国地缘战略的演变, 而且要进一步加强对这种战略决策依据的科学分析, 研究整个决策系统和决策要素, 并由此进一步揭示集团化和集团异化的发展规律, 探讨多极格局的态势和走向。这样, 必然大大深化国家地理研究。

在上述这些研究内容中, 战略决策系统和决策要素, 显然是研究的核心。区域合作中的战略决策, 通常包括两个层次, 即国家层次的决策和企业层次的决策。决策层次不同, 对决策系统的考虑角度也不一样, 包括在国家 and 具体要素上。国家层次的决策, 涉及到国家关系的走势, 包括对集团化、集团异化和多极格局的取向, 因而对国家关系必须从全方位、多元化的角度考虑, 既要研究双边关系, 也要关注多边关系。企业层次的决策, 主要涉及具体合作对象、项目和地区; 它在国家的选择上, 一般不牵扯到双边或多边关系, 主要从企业角度具体比较合作条件的优劣。由于这两个层次的决策目标不同, 各自所要考虑的具体因素自然也不一样。

在政治因素中, 前者需要考虑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区位、国家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利害冲突等因素。后者则无需考虑这些因素, 主要注重政局的稳定性、法制

建设状况、政府机构办事效率等等。在经济因素中,从国家考虑,主要有资源禀赋、战略资源供求、经济实力、市场容量与潜力、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等。而企业主要关心的是具体的资源条件、产品销路和市场潜力、劳动力供求、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等等。在文化因素中,国家考虑的主要有民族禀性、民族结构及其关联性、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等等。而企业主要关心的是劳动力素质、社会文明程度、居民生活与行为方式等等。此外,象军事、国防方面的因素,在国家关系中是必须加以考虑的,而作为企业则一般无需考虑。可见作为国家层次上的战略决策,所需考虑的因素要广泛得多、复杂得多。因此,涉及集团化、集团异化和多极格局的地缘战略决策,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适应研究内容的需要,在研究方法上必须有新的和突破。

3.3 研究方法的探索

国家地理的研究方法,长期以定性为主,包括资料分析、分类比较、典型实例、定性归纳等等,只辅以简单的数量统计分析。这种传统方法显然满足不了集团化、集团异化和多极化这类地缘战略决策研究的需要,必须借助数学、统计学、运筹学和系统科学的理论、方法,在实现定性与定量的有机结合上,对研究方法进行积极、大胆的探索。

对于地缘战略决策这样一种复杂、庞大的系统工程,从定性研究入手,建立一个科学的、接近客观实际的、操作性强的决策系统,是研究工作的关键。为此,需解决两大问题。一是考虑什么?那些要素(因素)应作为决策依据;二是怎么考虑?对已确定的诸要素(因素)如何进行全系统的量化评价。包括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和定量分析的具体方法。

3.3.1 决策要素系统的建立 根据对国家关系的定性研究,但凡国家的战略决策,必然涉及众多的领域,并取决于其中的很多具体因素,而且它们各自在战略决策中的作用及相互关系复杂多变。因此,这样的决策系统的建立,既要考虑其基本框架的完整性,同时也要考虑对各个国家的广泛适应性。

所谓基本框架的完整性,首先在总体上它应该是一个有层次性的大系统。第一个层次应包括国家关系所含盖的主要领域,如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等,构成为要素层次。第二个层次是上述要素中影响战略决策的一系列具体因素,也就是说把战略决策中可能起作用的所有因素,按上述要素分解成相应的子系统。比如政治要素子系统中,包括有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区位(地理上的位置、距离,政治格局上的位置、角色)、历史遗留问题(边界与领土争端)、现实利害冲突(海洋权益、共享资源、国际通道)、国家关系渊源(民族历史恩怨、战争遗留问题)等诸多因素。其次它应能适应国际形势和时代背景的变化。形势和时代背景变了,各要素(因素)在战略决策中的作用也就不一样。冷战时期,政治、军事要素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利益,故对战略决策起主导作用,但经济要素也不可偏废,它关系到经济上的承受能力和利害得失。冷战的结束,给国家安全利益赋予更多的经济、科技和文化内容,因而经济要素的主导作用日益显著。但也并非一切取决于经济。在三峡工程上的中美合作,就因美国政府“把政治考虑与商业考虑搅在一起”,最终断送了美国公司参加工程投标的机会。同样,在目前形势下,军事(国防)要素在战略决策中虽退居次要地位,但也并非无足轻重。美国国会公布“考克斯报告”,并企图鼓动西方联合对中国实行科技封锁,大有不惜损害中美经济合作、甚至破坏中美关系之势。所以这样决策系统必须考虑不同的国际形势与背景,兼顾主要与次要因素,尽量避免疏漏和偏缺。

所谓对国家的广泛适应性, 就是说列入该系统中的要素(因素), 必须是各种双边国家关系决策中所考虑的要素(因素)的综合。事实上, 不同的国家之间, 影响战略决策的因素往往有多有少, 其影响的程度也有主次之分和轻重之别。例如, 加拿大和古巴之间, 影响战略决策的要素(因素), 就比美古之间少, 而且影响的程度、主次与轻重也不一样。这一点从前面的分析中已得到印证。所以, 决策要素系统的建立, 需要在国家关系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加以综合。

3.3.2 关于评价指标体系 决策要素系统建立后, 对于该系统中所有具体因素在决策中的作用, 必须逐一放在双边关系中进行分析评价, 而且这种评价应适用于所有双边国家关系, 因此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评价指标体系。

在上述决策系统的具体因素中, 其评价指标存在两种不同情况: 有些因素有量化指标, 如经济要素子系统的所有具体因素, 以及科技、军事子系统的多数具体因素; 而另一些因素则没有量化指标, 通常称为“软指标”, 如政治、文化要素子系统的所有具体因素。因此, 这个统一的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需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软指标”定性分析的“量化”问题; 二是两类指标定性、定量评价的综合集成问题。

关于第二个问题, 关键是建立综合集成的基本框架, 即第一层次各大要素的决策贡献率的分配; 以及第二层次各子系统中具体因素的决策贡献率的分配。把两个层次的指标总分各自都定为 100 分, 然后根据专家咨询中凭各自经验给出的每个指标的权重, 加以综合, 便可得出两个层次、各项指标的决策贡献率, 由此构成综合集成的基本框架。

关于软指标定性分析的“量化”, 可以在每个具体因素定性分析的基础上, 分别设定指标评价几种可能的定性等级, 并确定每个等级的评价底分。然后通过咨询, 各自凭经验选出各项指标的评价等级。综合专家调查的评价底分, 即可完成软指标定性分析的“量化”。

以上两个问题的解决都必须借助专家调查, 而调查结果的科学性、合理性, 又取决于问卷调查表的设计和调查对象的选择。因此, 调查表的设计既要全面体现上述定性分析的基本框架, 又要简洁明了, 让调查者易于理解。调查对象的选择, 应尽量考虑在专业构成、工作单位、职称与年龄结构, 以及地理分布上, 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如专家的专业构成应包括世界政治、世界经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世界地理与国家地理、区域地理与区域合作、地缘政治与地缘战略等等; 工作单位应包括教学、科研以及政府外经、外贸、外交等有关部门和机构。这样可以使调查结果尽量做到客观、科学、具有广泛代表性。

在上述定性研究以及定性、定量综合集成设计的基础上, 运用层次分析、主因子分析、相关性分析等定量分析方法, 可进行地缘战略决策依据的综合评价以及合作对象与合作战略优化方案的选择; 引入“场”的有关理论和方法, 可进行集团化、集团异化发展规律的研究, 并通过区域合作及多极格局模式的研究, 预测多极化的走势和多极格局的动态模型。这样既可为我国在区域合作及世界地缘政治上的战略选择提供科学依据, 营造有利于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国际环境, 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建立; 同时也可望在研究方向、内容以及理论、方法上, 推动国家地理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李晓 等. 世界经济一体化与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刍议[J]. 世界经济, 1994(4): 37~43.
- [2] 伍贻康 等. 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比较[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4.
- [3] 戴念龄. 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区域外直接投资效应的实证[J]. 美加经济研究, 1996(2): 11~17.
- [4] 辞海编辑委员会. 辞海(缩印本)(1979年版)[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0.
- [5] 文云朝. 集团异化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J]. 世界地理研究, 1998(1): 1~8.
- [6] Marcin Rosciszewski, La Pologne et al. Nouvelle Architecture Géopolitique Européenne[M]. Recherches de Géographie Humaine, Société Géographie de Liège, 1996. 123~130.
- [7] 世界资源研究所. 世界资源报告(1994~1995)[M].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6.
- [8] United Nations, 1995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Yearbook[M]. United Nations, 1996.
- [9] 储祥银 等译. 世界投资报告 1996[M]. 北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1997.
- [10] 刘伉. 世界社会文化地理手册[M].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1993.
- [11] 李春芬. 区际联系——区域地理学的近期前沿[J]. 地理学报, 1995(6): 491~495.
- [12] 文云朝. 关于地缘研究的理论探讨[J]. 地理科学进展, 1999(2): 172~175.
- [13] 刘妙龙 等. 地缘政治历史、现状与中国的地缘战略[J]. 地理研究, 1994(3): 69~75.

Group alienation and theoretical thinking of national geography study

WEN Yun-chao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 grouparization are the epoch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world of today. In this paper the conception of group alienation has been posed by theoretical anylyses of group development and actural example analyses such as the disintegration of CMEA and interior conflict of North American Group. In explained that the group alienation appearance is not isolated and fortuitous, but was resulted from the inner contradiction evolvement of the group it self under a certain exterior condi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group alienation is a real reflection of country relation adjustment and the geopolitical strategy change in regional cooperation. Therefore, group alienation, the new phenomenon and new problem appeared in the regional cooperation at the present time, provided a series of new issues for studing national geogrphty, also aroused the theoretical thinking of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extending the study domain, deepening the study contents and developing the study method.

Key words: group alienation; national geography